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材系列

比较文化学新编

*A NEW STUDY
ON COMPARATIVE CULTURE*

► 方汉文/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材系列

比较文化学新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化学新编 / 方汉文著.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材系列)

ISBN 978-7-303-11523-5

I. ①比… II. ①方… III. ①比较文化—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4861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25.25

字数: 404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策划编辑: 马佩林 责任编辑: 马佩林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张同龙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 序

方汉文

进入 21 世纪，学科建设已成为高等院校科研与教学之中枢，特别是创新型的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教材系列的编撰更是学科建设之基石。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材系列》即是当代本学科建设的一项代表性工程，也是中国高等院校教材进入国际化实践过程的成果。

西方学术中“学科”(discipline)一词的本义之一是“界限”，学科的基本意义就是对研究对象作出界限的规定，划分特定的研究范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把理论科学分为物理学、数学和第一哲学（也称为神学）；应用科学则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两大类；艺术是独立的学科。

中国学术的学科与教材更是渊源有自。春秋时期，孔子在教学生学习“六艺”的过程中，删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其实就是最早的教材，这一点从《论语》中孔子多次说到的“学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的学科正式划分是在汉唐时期，特别是唐代之后，科举制度与传统教育都使古代学术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当然，学科的教材也基本确定，“四书五经”等成为学科的主要教材。

比较文学学科自 20 世纪进入中国以来，教材建设一直极受重视。新千年来临后，中国学者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概念。这一观念鲜明地反映在教材创新进程中，打破了传统的模仿国外教材的局面。各个研究方向的多种教材纷纷推出，呈现出多元化的教材布局，为本教材系列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本教材系列是一套面向全国高等院校学科建设与教学实践的规范性教材，其内容、结构与目标定为：

一、理论创新性：对本学科教学的基本内容与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新理论体系予以全面反映，“周虽旧邦，其命唯新”。当代中国高等院校的科研与教学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沃土，从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

二、汇融当代国际学术与教学研究的新观念，编撰普及型与专著型相结合、具有国际理论视域的教材，特别是对 21 世纪以来本学科的国际新进展深入研究，扩展研究范围，以此推进中国高等院校教材的国际化，这是本教材系列的目标之一。

三、本教材系列是在全国多所重点大学与地方院校教学第一线的优秀教师，特别是近年来留学归国的学者们的鼎力合作下形成的。他们具有丰富的教学科研与教材编撰的经验。撰写者承担了国家与教育部的多项科研课题，成果屡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被列入教育部研究生教学用书，他们中很多人也是各级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的主持者。

本教材系列的目标在于以革故鼎新、披沙砾金的精神，为教学与科研提供规范性的、最受广大师生欢迎的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教材。

学科建设乃学术研究之千秋功业、高等教育之津梁；教材系列堪称学科之中坚、教学之基石。愿 21 世纪中国高等院校学科教材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得以流被海内外，偕同广大师生与读者与时俱进。

目 录

第一章 比较文化学学科的历史阶段	1
第一节 比较文化的滥觞与学科意识萌生	1
第二节 比较文化研究的中期阶段	10
第三节 当代比较文化研究	20
第四节 比较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建构	23
第二章 学科中心范畴与基本观念	29
第一节 学科意义的“比较”	29
第二节 “文化”与“文明”范畴	33
第三节 比较文化学的定义	45
第三章 比较文化学学科的研究对象	49
第一节 文化起源的理论	49
第二节 农业经济与人类文明诞生	55
第三节 比较文化中的“东方”与“西方”	57
第四节 比较文化的形态观念：“二东二西之学”	66
第五节 东方与西方的互相认识过程	69
第六节 寻觅东方文明：“赛里斯国”	72
第七节 世界八大文化体系	78
第四章 文化体系的生成机制与比较研究的	
材料和方法	82
第一节 文化体系的生成机制	82
第二节 材料的处理	83
第三节 比较方法的来源	92
第四节 历史实证研究方法	95
第五节 价值评判研究	103
第六节 文化起源的比较研究	113
第七节 关于人类学、心理学等方法的比较研究	117

第五章 亚洲太平洋文化体系	126
第一节 亚洲太平洋文化的起源	126
第二节 亚太体系的形成	131
第三节 文化交往与融新	135
第六章 南亚文化体系	148
第一节 南亚文化的故地与中心	148
第二节 南亚文化与其他文化体系的比较	151
第三节 印度文化与外来影响	157
第四节 印度与东西方的文化交往	161
第五节 印度文化的东南亚传播	164
第六节 关于“印度化”与佛教远行	169
第七章 世界的西方：地中海大西洋文化体系	172
第一节 地中海文明的起源	172
第二节 西方建立的世界大帝国——罗马帝国	177
第三节 西方封建社会的特性	180
第四节 东西方冲突与十字军东征	184
第五节 西方的工业化与世界经济体的形成	186
第六节 东方与西方的互相认识	189
第七节 18 世纪之后欧洲对中国与东方的看法	202
第八章 伊斯兰文化体系	212
第一节 西亚古地的两河文明	212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与文明诞生	214
第三节 古代波斯大帝国	217
第四节 阿拉伯与伊斯兰教兴起	223
第五节 伊斯兰宗教信仰的传播	228
第六节 阿拉伯世界大帝国	234
第七节 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	239
第九章 北美大洋洲文化体系	244
第一节 新大陆的发现与新文化体系雏形	244
第二节 文明传统与变革	247
第三节 美洲进入世界文化体系	250

第四节	新大陆文化体系的构建	253
第五节	最后的新大陆：大洋洲文化	259
第十章	拉丁美洲文化体系	262
第一节	墨西哥高原上的古代文明	262
第二节	美洲的城邦文明	265
第三节	安第斯山地文明	267
第四节	美洲大殖民的文化再铸	270
第五节	复合型的拉美文化体系	274
第十一章	非洲文化体系的历史命运	277
第一节	人类文明起源地：北非埃及	277
第二节	世界格局中的古代非洲文明	288
第三节	古国迦太基和努比亚	290
第四节	东非城邦与斯瓦希里文明	292
第五节	西非文明与马里大帝国	293
第六节	中非与南非的古代文明	294
第七节	非洲与古代东西方文明	295
第八节	非洲与中国之间的交通	298
第九节	非洲文化的当代形态	300
第十二章	犹太文化体系	306
第一节	文明古地巴勒斯坦（迦南地）	306
第二节	以色列文化的历史	308
第三节	《圣经》古史与犹太文化关系的变迁	311
第四节	以色列与埃及和两河文明	314
第五节	以色列与古希腊罗马	317
第六节	犹太文化特性的现代表现	323
第十三章	文化体系的可通约性与可比性	325
第一节	文化译介、交流与可通约性	325
第二节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所谓“文化不可通约论”	331
第三节	不同文化的可比较性	336
第四节	比较文化学学科的当代意义	340

第十四章 “传统融新”与四大文化复兴运动	344
第一节 殖民运动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融新”	344
第二节 文化体系的转型	350
第三节 半殖民地的文化渗透	352
第四节 四大文化复兴	358
第五节 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	360
第六节 拉美文化的复兴与“复魅”	363
第七节 犹太文化复兴	365
第八节 儒学的世界化及其复兴	369
第十五章 文化体系的冲突与融合	374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关系	374
第二节 世界流失文化遗产征约：历史与现实的衅争	378
第三节 未来社会的文化忧虑：“黑暗恐怖”与“技术理性”	384
第四节 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388
后 记	395

第一章 比较文化学学科的历史阶段

第一节 比较文化的滥觞与学科意识萌生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 21 世纪第一份《世界文化报告》(2000) 的主题是“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撰写者们认为：

现在，文化的特征 (identity) 和表达、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共存、文化的发展和遗产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管文化领域中的核心问题。……文化的特征和表达受到了全球化进程多种方式的挑战。……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不仅仅对文化本身，而且对整个人类发展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①

文中强调了全球化时代中对文化多元化等多种思潮的关注和坚持，指出继承和研究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强调如果放弃这种努力，将会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我们认为，这绝非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当前世界文化关系及其发展的冷静客观的判断，并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意义，尤其值得具有数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们深入体会个中三昧。

当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从 15 世纪的环球海上航线开通之后，世界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出现了大交流，特别是欧洲 18 世纪启蒙主义之后，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世界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加速了西方文化的扩展。从那以后，西方文化逐渐在世界居于主导地位，并且由此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也存在文化发展的隐患。其中重要的就是多种独立文化被消解与所谓的“一体化”(unification) 进程，使得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面临考验。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与模式。简而言之，世界多民族文化处于一种转型的关键时期。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 (2000) ——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序言》，关世杰等译，1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6 世纪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大规模扩张,使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化,特别是 17—18 世纪,欧洲开始重新认识与评价亚洲与东方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开始了直接交往的新阶段,比较文化学这门新学科应历史的呼唤而萌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使得东方古老文明的智慧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这也给予东方与中国学者一次创造的契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主要是接受和学习西方的学科模式和学科思想。现在中国学者则面临着创造新学科的可能,因为多种文化的创造取代了单一文化的创造,这已经是现代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比较文化学,是中国学者可以显示自己理论创造力的一个新学科。

要建构比较文化学学科,首先要对于人类文化进程有新的认识。

人类文化从滥觞到今天,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从距今约 1 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开始,人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般认为,人类没有文字之前的时代属于史前时代,最接近现代的是青铜时代,大约距今 2500 至 5000 年。青铜时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约在距今 1 万年至纪元前 7500 年的时期;旧石器时代在距今约 40 万年至 1 万年的时期。从旧石器时代至今,在这不算短的历史时代中,人类从原始人进化到现代人,创造了宇宙中原来没有的许多事物。人类的创造尽管分门别类,形态万千,如农业、牧业、渔业、林业、工业、国家政治制度、城邦与城市、法律、道德伦理、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但所有这些从广义角度看都是一种文化的创造。可以说,人类行为的实质就是不同文化的创造。当今世界上有数百个国家,成千上万的民族,各自都有自己的文化。既然人类历史是如此久远,人类社会、国家民族的划分又是如此之多,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人类文化,正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多元共存的重要途径,因此比较文化学学科的诞生是必然的。

不同文化的发展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历史起源与历程。从纵向考察,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文化,甚至同一时代也会有多种不同的文化。我们以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为例,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曾经把它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列表如下:

旧石器时代前期:

舍利文化期 (Chelleian)

阿舍文化期 (Acheulian)

旧石器时代中期:

莫斯耶文化期 (Mousterian)

旧石器时代后期:

奥瑞聂文化期 (Aurignacian)

梭鲁特文化期 (Solutrean)

马格德林文化期 (Magdalenian)

新旧两石器时代过渡期:

阿奇文化期 (Azilian) ①

可以看出, 仅仅欧洲旧石器时代就有如此多样的史前文化形态, 更不要说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多种多样、形态各异的文化了。世界文化的演变呈现两种特征: 一方面, 每一种文化的更替期越来越短, 所以时代愈晚近, 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愈加强; 另一方面, 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混合与融合加剧, 比如欧洲的希腊罗马文化与后来的基督教文化融合起来, 形成了地中海一大西洋文化。中国的黄河长江文化从上古时代起就与周边民族文化互相交往与融合, 中国文化本身即是由汉族与“夷蛮狄戎”各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 这是多民族合一的大中华文化体系。因此, 就需要我们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进行比较研究, 以便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 文化形态在嬗变中, 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于一些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类型, 只有通过比较, 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特点, 才能知道文化传统是如何传承与革新的。

另外, 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世界文明之间的平行的、横向的联系中, 我们也必须通过比较才能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同一。世界文化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中产生, 它们之间有共同性, 也有差异性。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这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世界文化类型可以说是千差万别, 甚至同一个民族都可能多种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目标,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为了能从本质上把握世界文化, 揭橥世界文化的共性与特性的联系, 为了研究的需要, 我们从具体的类型入手, 划分世界文化体系, 进行比较研究。在本书中, 我们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八大文化体系, 以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形态关联为主线来进行共时与历时方法相结合的比较研究。

历时的与共时的、历史的与现实的文化比较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历时与共时的文化比较研究各自都只是从一种视域进行的研究, 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 才可能对多样的文化体系有实质性与具体性的掌握。这就是比较文化学的主要目标。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专门的学科来研究世界多种多样的文化体系, 如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同一、它们的历史发展规律与特殊性。这一学科就是

① 裴文申:《旧石器时代之艺术》, 14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比较文化学。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化学基本上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上古到 19 世纪，这是比较文化的史前期，是最初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多种文化类型与体系之间的互相交流与影响，产生了初步的文化比较，这种比较以直观的、形式上的比附为主，是对同一与差异的初步区分，为以后的比较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是最早进行文化比较的国家之一，这种比较是从古代中国与异域文化和周边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开始的。中国文化与其他古代文化一样是多元起源的，多种文化来源之间的比较自然成为重要视域。这种比较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中对于异域文化的记载，殷墟卜辞中有大量关于“土方”、“鬼方”、“牧方”等民族的记载，这是与殷相邻的异邦。罗振玉编的《殷虚书契菁华》第五—三片所刻的“方征于牧”等，就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征伐。据有关考证：“牧国在殷之北，则土方亦必在殷之北。……卜辞中所之土方与鬼方必为猃狁之部族无疑。”^①直到周宣王时才消除了猃狁之患，这些已经消失的古代民族在汉语典籍中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其余关于中原与周边民族交流的记录也相当多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所谓周穆王西行的记载。公元 279 年在汲县战国魏安厘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古代典籍《竹书纪年》《史记》中都有关于周穆王西狩的记载，是相当宝贵的文化比较研究史料。全面分析文化联系的是《尚书·禹贡》，书中指出：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四海会同，六府孔修。……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铎，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甸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采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侯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这一段话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比较文化研究之一，其中已经把“淮夷”、“海岱”等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比较，指出了各地人民有生活习俗、政治制度、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 2 卷（考古编），439～440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所以，当代学者从比较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待《尚书·禹贡》，认为其中的区域划分包括了黄河、长江等中华两河流域文化，而且是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之比较。^① 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正是一语中的。从具体的文学、历史、哲学观念的比较来说，中国古代史料中也早有先例，其中广为人知的就是春秋时期的“季札观乐”的记载，可以视为最早的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范例。

吴国的公子季札（公元前 576—前 485）是泰伯的二十代孙，吴王寿梦的季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所记载的季札来鲁国观乐，就是古代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

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沝沝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

季札在这里绝不是简单地评价为他演奏的诗歌与音乐，而是从批评诗乐入手，检讨了各国的政治、历史与文化。他首先赞美的是“二南”，实际是对周王朝的赞颂，对邶、鄘、齐、卫和秦等国的政治经济大加赞美，而对郑、陈等国的社会生活则有尖锐的批评。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有褒有贬，态度鲜明，都是依据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所作的评价。

司马迁的《史记》中开始有《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等周边少数民族或者古代的异己民族的记载，把这些民族的社会

^① 参见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4~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制度和生活习俗与中原进行比较,已经是一种相当系统的比较文化研究。其中记录最为详尽的是“西域”各民族文化,笔者曾提出比较文化中的“二东三西”之说:所谓“三西”即指古代的西域各国、古代的“西土”——印度、现当代的西方——欧美各国。这三者都与中国文化之间有大规模的历史交流,包括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佛经的东传,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中亚与东南亚的传播,郑和船队的远洋航海,元代蒙古大帝国对于西亚和欧洲民族的西征,谱写了中外比较文化多姿多彩的乐章。从司马迁开始,中国的比较文化已经掀开重要的一页。《史记·大宛列传》已经不同于以前典籍中对于异域的描绘,真切地记载了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众多古代民族,认为中国西方是安息、条支、黎轩、奄蔡四国。据学者考证,安息相当于波斯;奄蔡在里海东北角;条支位于阿拉伯半岛,就是唐代所说的大食;而黎轩可能就是所谓的大秦,到达古罗马的疆域了。进入唐代,中外交流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大唐西域记》更是以作者玄奘西行求法的经历与丰富的史料为比较文化研究写下光辉篇章,这是比较文化学的经典之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往五天竺国传》《经行记》《西域番国志》《唐大和上东征传》《南海寄归内海传》《诸番志》《释迦方志》《西游录》《异域志》《真腊风土记》等也是比较文化学早期的重要著作。

西方的比较文化研究起源于古希腊,雅典时代前后就有了关于埃及、波斯以及中国等东方文化的记载。阿里斯提士(Aristeas)的《阿里麻斯比》一书,已经记述了当时在中亚地区的“塞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的西方学者一直把游牧的“塞人”当成中国人。据亨利玉尔(Henry Yule)的《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记载,罗马时期的地理学家斯脱拉波(Strabo,约公元前54—前24)曾经有过关于中国人即所谓赛里斯(Sares)人的记述:“诸王共拓疆域至赛里斯及佛利尼国(Phryni)而止。”据笔者之见,这里的“塞人”可能并非中国人,而是当时居于亚欧之间的一些古代游牧民族,只是当时的罗马人已经风闻东方有一个大帝国叫中国,所以将赛里斯人错认为是中国人。奥古斯都(Augustus)时代,诗人马罗(P. V. Maro)的诗中屡次提到赛里斯,但对于它的所在之地却说得太不清楚,只是说在中亚细亚及极东的地方。但是无可怀疑的是,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就已经与西方的“大秦”有了直接交往。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了“黎轩善眩人”的事迹: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而

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

这个黎轩，按照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通报》（1915）中的看法就是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当时正在罗马帝国治下。以笔者所见，中国典籍中所说的乌提散、迟散与阿荔散等，皆为当时的亚历山大里亚（disan）的音译，都是指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由于汉语与埃及和希腊语言文字不同，所以只能音译。

中国与埃及的国家外交是汉桓帝延熹九年的大秦王安敦遣使来华，《后汉书·西域传》中是这样评价大秦国的：

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这个“大秦”应当就是古代罗马大帝国。公元138年，罗马皇帝哈德良逝世，其义子安东尼（即《后汉书》中所说的“大秦王安敦”）即位，他于公元161年卒于位上，由他的女婿马克·奥里略即罗马皇帝位。而安东尼生前派出的使臣是汉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才到达中国，这位使臣取海路来华，路途至少用了六年时光。我们不能不感慨于古代东西方交通的艰难，同时，也要对这位长途跋涉、开辟东西方直接交通的第一位西方使臣的历史功勋予以肯定。东方的汉代中国与西方罗马由此实现首次外交，实在令人庆幸！

从此，汉唐之后，中国诗文中才出现了“夜光璧”之类外来事物，说明东西方交流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东西方克服高山大海的阻隔，实现互相交往的罕见记录，也是比较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其意义非常重大。^①

自从中世纪之后，特别是蒙古大军西征，对东西方文化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统一的元帝国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亦具有利的方面。马可·波罗

^① 参见方汉文：《比较文明史：新石器时代至公元5世纪》，16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Marco Polo)、奥多里克 (Odoric de Pordrnone)、贝因卡宾 (Pain del Capine)、鲁布如可 (G. de Rubrouck) 等西方探险家来到中国, 传闻中的东方古国——中国——对西方才变得真实可信。《马可·波罗游记》《奥多里克东行述》把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典制介绍给西方, 使得欧洲大为震惊, 对于这种远在东方的异类文化的巨大成就感叹不已。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对中国的一知半解所造成的误会。可惜的是, 横跨欧亚大陆的元帝国存在时间很短, 它灭亡后, 中国与西方的直接交往再次断绝。

直到 17、18 世纪, 欧洲再次掀起“中国热”。先是欧洲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 如德国利奇温 (Reichwein A.) 的名著《18 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中所说: “17 及 18 世纪, 耶稣会士是沟通欧洲和远东文化的桥梁。”他们所开始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翻译中国经典, 初步建立了“汉学”系统。应当说欧洲汉学的建立是西方的“东方学” (Orientalism) 整体中的一个方面, 是从古代以来西方对于东方的研究的总合性成果。以《东方学》一书著称于世的赛义德 (Edward W. Said) 曾经对于东方学的发展有过简洁的描述:

在基督教西方, 东方学的正式出现被认为是从 1312 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 (Church Council of Vienne) 决定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阿维农和萨拉曼卡”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的。……一般说来, 直到 18 世纪中叶, 东方学研究者主要是圣经学者、闪语研究者、伊斯兰专家或汉学家 (因为耶稣会传教士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到 19 世纪中叶, 东方学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巨大的学术宝库。^①

虽然这只是对东方学历史最粗略的描述,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 17—19 世纪的 300 年间, 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出现高潮。而且在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 汉学研究后来居上, 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坚。

要特别指出的是, 虽然至今还没有一种普遍认可的世界汉学确立标志, 但笔者认为, 综观西方的汉学研究史, 至晚到法国《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道德、习俗等的论丛》 (即《中国论丛》) 已经确立了相当有影响的、全面的汉学研究。西方从 1776 年到 1791 年出版的这套丛书, 共 15 卷,

^① [美] 爱德华·W. 赛义德: 《东方学》, 王宇根译, 61~63 页,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